论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制度化建设

高良坚

（广东海洋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广东湛江 524088）

[摘要]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理想信念教育是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是掌握高校意识形态领导权、主动权和管理权的一项重要战略工程。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势在必行。厘清理想信念的内涵、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内涵、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以找准制度化建设的着力点。明确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本质特征，制定利益导向机制、情感动力机制、身份认同机制和评价抉择机制四大策略。

[关键词]高校党员干部；理念信念教育；制度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作者简介]高良坚(1968—)，女，广东茂名人，广东海洋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处于深刻转型的中国面临着价值观多元化、复杂化的国内国际环境，理想信仰成为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意识形态工作也因此上升到极端重要的位置。高校是理想信仰形成的圣地，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尤其因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已成为意识形态角逐的主赛场。理想信念的引领权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理想信念的引领权要通过制度来贯彻落实。

一、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建设势在必行

理想信念教育只有通过制度化以实现常态化、规范化和系统化，才能筑牢好共同理想的坚实基础、凝聚好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补好中国梦的精神之“钙”。

（一）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性

高校党员干部是国家高级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的中流砥柱，其是否拥有坚定的理念信念直接关系到党在高校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关系到能否为国家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人才，能否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薪火相传。一些高校党员干部曾被批评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丧失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坚定。高学历高职称成为一些高校党员干部满足贪欲的工具，做事老到并善于表演与配合，一旦掌握公共权力，便“全心全意”打着小圈子的算盘，精心筹划“本山头”的利益与“梯队”建设，不惜挥霍大量的公共资源，以攫取最大化的个人利益和小圈子利益。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是减少党员干部腐败存量和增量的根本性途径。目前惩治腐败既要依靠运动式反腐打“老虎”拍“苍蝇”，也要从制度设计上进行长远的防腐反腐，筑造好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的牢笼。但从源头而言治腐还是从党员干部个体内部的思想境界开始，从理想信念开始。根据王延超教授针对 16 个省市党员干部理想信念问题的 1590 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显示，47.5%的党员干部认为腐败是因为“自身放松对世界观的改造”，65.7%的党员干部认为做好理想信念工作重点在于“切实加强理想信念教育”。[1]由此可见，党员干部对加强和改进理想信念教育充满期待，同时也显示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有效供给严重不足。

（二）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紧迫性

高校是意识形态角逐的主赛场，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使得角逐更加激烈。理想信念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理想信念教育是意识形态阵地斗争的重要手段。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撰文

指出“今天（指 1988 年）东欧进行和平演变的时机已经成熟。1983 年，我游历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遇见了几位东欧集团的领导人和数百名平民。从他们当中传出了一个明朗的信号：共产主义教条作为激发人们的力量已经死亡。”“东欧共产党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信仰。当今大多数都是野心家和官僚。共产党的意志和信心已经破灭。”“正在崛起的一代东欧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而实用主义则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2]后来发生的东欧剧变与苏联的解体得到了验证。当今中国高校党员干部的思想不泛工具理性主义，理工科院校尤其突出，他们认为科学实用才是硬道理，理想信念等人文精神可有可无，甚至叫嚣取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鼓吹思想政治理论课虚空论无用论主张非意识形态化，这种思想在党员干部队伍中占有一席之地，恰恰是为西方和平演变打开的缺口。“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3]，高校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阵地，如任这些工具理性主义思想、非意识形态论的泛滥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时，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观的思潮此起彼伏，对党员干部具有极强的蛊惑力。因此，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手段成为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具有紧迫性。

二、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内涵与构成要素

厘清三个内涵——理想信念的内涵、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内涵、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以找准制度化建设的着力点。

（一）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内涵

理想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有实现可能性的、对未来社会和自身发展的向往与追求，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4]产生理想的动力源于对现实的永不满足以及对未来的不懈追求。信念是认知、情感和意志的有机统一体，是人们在一定的认识基础上确立的对某种思想或事物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的心理态度和精神状态。[5]理想是信念的基础和前提而信念是理想的支撑和动力，具体运用中有时理想信念是同一个概念。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民族、每个政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理想与信念。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是指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也就是执政党的理想信念，是指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共产主义理想的内涵包括，一方面作为一种最美好最理想的人类社会制度是党员干部的最高理想，符合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最高利益。另一方面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以及这种理论体系指导下的现实运动是党员干部的最坚定信念。目前高校党员干部的坚定信念就是坚定“三个自信”，坚定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往开来蓬勃发展至关重要，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建设对此发挥积极的作用。所谓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导向，将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活动的运行要求以及对相关教育制度建设主体的基本要求纳入正式规则体系，通过制度的刚性约束和主体的职责落实，使得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活动不断趋于规范化、系统化、组织化和常态化的动态过程。同时，也是党员干部理解共产主义理想与“三个自信”的真谛、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与坚定“三个自信”信念的过程。

（二）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构成要素

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是由诸多要素所构成，可将其归为主体影响要素与非主体影响要素。主体影响要素主要是指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等对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建设所具备的责任机制、价值取向、教育理念、创新意识等，这是影响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建设的关键因素。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对待制度化建设所具有的重视程度和责任程度，直接影响着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国家许多原则性的方针政策，必须经过地方政府的实践加以具体化和可操作化，使之符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才能发挥积极的效用。”[6]因此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切实履行相关职责，及时跟踪贯彻执行情况，为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制度建设和有效实施提供必要的支持。高校党政领导集体是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直接领导核心，统管着高校意识形态的阵地，是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建设中最关键、最直接的主体影响要素。非主体影响要素主要是指制度体系建设的内在影响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其中制度体系建设的内在影响因素如学校教学计划管理、教学运行管理、教学质量管理与评价等，它们之间的规范性和系统性，直接影响着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可行性与实效性；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来自国内外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环境变化以及各种思潮的变化等，这些因素可以看作影响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建设的社会环境与背景，是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

三、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本质特征

尽管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构成要素众多，受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因素复杂，但它直接取决于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体系和发展道路。举什么样的旗帜、走什么样的道路、运行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着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内容与本质。因此，教育的制度化建设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体现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

（一）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些论断清晰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理想就是全面建成小康，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坚定“三个自信”的信念，这就要求理想信念教育的制度化建设必须始终如一地体现和反映这条主线，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制度化，中国梦的制度化，就是坚定“三个自信”信念的制度化。而坚定“三个自信”信念的制度化就要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三个有机统一。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建设相应地由党委领导负责，充分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充分展现党员干部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秉承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同时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必须坚持法治化方向、走法治化道路，与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基本方向和国家法制化的基本目标相一致。

（二）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灵魂——契合与认同

不可否认党员干部作为生命的个体拥有自己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最终依归是个人的理想信念与党和国家的理想信念相契合，是个体的理想信念与群体的理想信念相融相洽。理想信念教育的制度化实质是将一种思想价值理念转化为一种制度、法律以及实践系统，相应地带有强制性。正如帕森斯所言“制度是规范的一般模式，这些模式为人们与他们的社会及其各式各样的子系统和群体的其他成员互动规定了指定的、允许的和禁止的社会关系行为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总是有限制的模式……制度在社会中处于与权利和义务相对的地位，与既定地位的个人所处的情境结构相对，并且它们规定了制裁和使之合法。”[7]在这种强制性中如何实现党员干部个体对国家理想信念的认同才是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建设的核心，它关系到人们心灵深处的问题但又是属于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因此，理想信念教育的制度化设计必须遵循三性。第一，充分体现理想信念的合法性。“三个自信”信念的合法性应该建立在党员干部的认同与信任上，必须充分表达“三个自信”的理论理性与历史理性的统一。第二，充分展现理想信念的合理性。将“三个自信”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满足人性需求的合理性生动形象地进行展示。第三，充分表现理想信念的合情性。“三个自信”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长期实践和理论升华，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人民感情，[8]这些合情性也要在制度设计上充分体现。理想信念教育的制度设计只有体现合法性、合理性、合情性才能实现党员干部个体的理想信念与党和国家的理想信念的契合。

四、高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建设的策略

理想信念教育的制度化是高校领域意识形态工作从个别的、不固定的和非健全的发展方式向普遍的、固定的和健全的发展方式转化的过程，也是理想信念教育系统规范化、稳定化、实效化和秩序化的变迁过程。它需要采取科学、合理的建设策略，尤为关键与紧迫的是如何使党员干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一）利益导向机制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可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即生理与安全需求）作为人类的第一需求，情感需求与信仰需求是人类的第二需求，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是实现情感需求与信仰需求的前提和基础。在此把生存与发展的需求看作是利益需求以方便阐述。党员干部作为有生命的个体自然遵循着人类本能的需要，生存需求与发展需求是人类存在发展的永恒的主题。理想信念教育的制度化建设如果不与这个永恒的主题紧密结合就注定是失败的。正如马克思所言：“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9]P514。“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9]P286“‘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能否深入党员干部的心灵深处首先与其利益需求结合起来。著名学者冯契说：“人们总是将理论认识提供的可能性和人的需要结合，以形成理想。”[11]因此，利益导向机制是制度化建设首要策略，对党员干部正当的利益诉求必须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充分的满足，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与党员干部的合理需要与正当利益的充分满足紧密地结合起来，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决定着党员干部正当利益的实现程度。

（二）情感动力机制

理想的内涵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一个理性范畴（蓝图、设计等），另一方面它

是一个情感范畴（心理、情绪等）。理想的形成过程首先是一个认知的情感过程，人类认识世界万物情字当先，好奇之情与愉悦之欢是认识事物的向导与动力。俗语有言“动之以情，方能晓之以理”、“感人心者，莫先乎于情”、“情到理方至，情阻则理难通”。马克思说：“激情、热情是使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2]列宁说：“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对于真理的追求。”[13]《鬼谷子.摩篇》有言“说者听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听。”《论语.雍也》中孔子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等等皆于一个情字。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要求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关照人的心灵，从心灵深处抚慰人，解除人的心理困扰，这一切无不要求对民众拥有一份热爱之情。而情从何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只有在与群众的交往中，在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的为人民服务当中产生，在改进工作作风当中产生。情感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情感一经产生便能有选择性地促进并巩固同这种情感有联系的认知。

（三）身份认同机制

弗洛伊德把认同看作是把一个自我转化为另一个自我的过程，以实现生命个体的归属感和满足感。身份是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与一定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资格。党员身份是个体在群众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先进性的代表，党员身份即意味着党员遵守党的章程，享受党员的权利与履行党员的义务。党员身份认同就是党员干部对自己的“党员”先进性的实现与认可，认为自己比群众更优秀更突出，有一种身份的荣誉感和对组织的归属感，深明自己作为党员干部所拥有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对国家与社会的担当。党员干部对自己身份是否认同以及认同的程度直接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的树立与坚定。因为党员干部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就是对党章规程的认同，也就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认同，也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身份认同度越高对“三个自信”的认同就越高。

但是，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党员干部对党员身份认同严重不足。根据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在回答关于“您对党章中规定的党员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了解”问题(单项选择)，受访党员有20％表示模糊或不清楚；[14]P145在回答关于“您身边的共产党员有没有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问题(单项选择)时受访党员占15.15％认为“没有，绝大部分和普通群众一样”；[14]P146在回答关于“您对当前党员履行权利和义务的情况评价”问题(单项选择)时，受访党员有 39.36％选择“不满意”，有19.15％选择“说不清楚”，调查者调研分析中对这19.15％是倾向于“不满意”。[14]P146因此建立身份认同机制是树立与坚定理想信念的关键环节。首先，建立党章学习的长效机制，确保党员干部对权利与义务的学习与运用。其次建立党员行使权利的保障机制。第三建立健全党员履行义务的监督机制。党员干部只有树立并增强对自身身份的自豪感、荣誉感和使命感以及对组织的归属感才能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认同。

（四）评价抉择机制

理想信念的形成过程不仅是一个认知的情感过程也是一个评价选择的理性思维过程。评价活动可分为官方评价活动（权威）和民间评价活动（非权威）。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最终是通过自己的评判作出选择的结果也就是民间评价的结果，但是离不开官方评价的引导。因

此，党员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建设应着重设计一个由官方评价引导的机制和一个让民间评价充分表达的平台所构成的评价机制，这是官方评价与民间评价各自的利弊所至。官方评价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如党中央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最高权威机构，以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作为评价标准提出了共产主义理想在现阶段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威机构对它的鼓与扬发挥了巨大的引领与导航作用，保证大方向的正确性，确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但官方的评价活动具有“在上性”，评价活动过程中容易使用行政命令导致单向灌输，缺乏平等对话所带来的互动共鸣。而理想信念的形成过程是一个自发自愿的平等对话的生成过程，这只有民间评价最能发挥出来，但是民间评价的局限性又容易“被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旧社会封建主义思想误导”[15]而偏离共同理想的正确方向。故理想信念教育的评价机制既要官方的评价作引领又要民间的评价充分发酵，使得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在正确的方向下自动自觉自愿地生成。

---

[1]王延超,王秋.关于党员干部理想信念认知的调研报告[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2(2):25.
[2][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168).
[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318).
[4]高校教材编写课题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5).
[5]高校教材编写课题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6).
[6]杨东文.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大有可为[J].教育与职业,2011(4)
[7][美]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M].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144-145).
[8]高良坚.以“三个自信”引领民主党派核心价值观的路径探析[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4):22-25.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4、286).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11]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76).
[12]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7)
[13]列宁.列宁全集:第 2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55).
[14]陈兰芝.中国共产党保持思想纯洁性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观照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4(145-146).
[15]陈新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价值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2).